

坦蕩怡天壽

——我的父親鮑彤

鮑 樸

自古以來為親人撰寫傳記性的文字一般難登大雅之堂，因為親者往往難以客觀公允。至少從司馬遷以降，中國傳統的人物傳記往往關注「爲人」，意即交代傳主一生的行為、性情和信念。在複雜的現代生活當中，個人的一生被劃分為「公開」和「私密」兩方面。於是「公開」和「私密」信息的不對稱使寫出傳主真實的「爲人」不免陷入兩難之境。親人作傳恐有失客觀，但外人作傳又可能對傳主非公開的一面缺乏足夠的了解。作為傳主之子不避嫌地整理出這篇文字，用意並不在於替代而是要彌補一些信息的缺失；關於已經反復公開討論過的事情這裏不再贅述。為了盡量不失客觀公允，作為一種簡單的嘗試，文章中不加評論地優先引用原始資料，包括書信、口述錄音、視頻內容和未發表的文字版鮑彤回憶（以下簡稱《鮑彤自述》）。

鮑彤身世

1928年春夏之交，在記憶中已經不確定的某一天，在杭州西湖飯店，我的祖父，上海益豐搪瓷廠的職員鮑佩人迎娶了我的祖母海寧人氏吳珩。婚後生育了五個孩子，父親鮑彤排行第三，生於1932年11月5日。家中長輩稱為「三三」。

揚子江從青藏高原起步，到上海流入太平洋。終端那塊土地，是我幼年的全部世界。我祖籍蘇州，出生在浙江海寧縣硖石鎮，童年因躲避日本飛機轟炸，隨父母逃難到上海的法租界，在那裏開蒙。（《鮑彤自述》）



鮑吳婚後很快有了孩子。大女兒鮑令詩1929年生（右二），三子鮑彤（抱在手裏的嬰兒）1932年出生。右一是吳珩的二姐吳織。

1937年秋天，北京發生「七七事變」。8月13號，日軍轟炸上海市，隨後也轟炸到硖石。上海到硖石經過杭州的鐵路被炸，海寧也不安全。於是媽媽帶著我，第一步是躲到鄉下曹家圩。媽媽家的祖墳、我外祖父和舅父的佃戶都在曹家圩。日軍佔領了上海和硖石，但是不經常去農村。偶爾日軍出現，農民就立即報信說日本人來了，於是我們就躲到草垛子裏頭。(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37年的秋天去了，冬天很冷的時候爸爸從上海到曹家圩來過一次。春天，他來信說要我們搬到上海去，於是全家在1938年春夏之交搬到上海。住在法租界貝勒路337號4弄(貝勒路 Rue Amiral Bayle 後來改成黃波南路)，我們全家住20平方米左右的兩間「亭子間」。(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38年秋天，我上了家附近的「民生小學」。對我來說，民生小學課程過於淺顯。從二年級下學期開始，媽媽決定將我轉學到另一個離家近的「崇實小學」。「崇實小學」教學質量好，學生很多，比較擁擠。我在崇實小學一直念到六年級畢業。然後接著念就在街對過的崇實中學。從1943年夏天到1946年夏天，我的初中是在崇實中學上的。(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46年夏，我初中畢業，要離開崇實中學，進入南洋中學。那個暑假，我們家空前熱鬧。我的二姊令華，不滿三歲就隨大舅父吳其昌到武漢去了；1944年大舅父病故；現在二姊終於因抗戰勝利而回家了。(《鮑彤自述》)

崇實中學校長沈西賓是上海南洋中學的畢業生，與母校南洋中學有約，每年將最好的初中畢業生保送到南洋中學上高中。1946年的秋天，我被保送到南洋中學，直到1949年4月畢業。(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讀書與修身

1942年，上初中前的暑假，父親教我讀《孟子》，替我打開了一個人性的世界。孟夫子使我懂得，人，應該把別人當人；誰把別人不當人，誰自己就不配成為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民第一，國家次之，皇帝是微不足道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鮑彤自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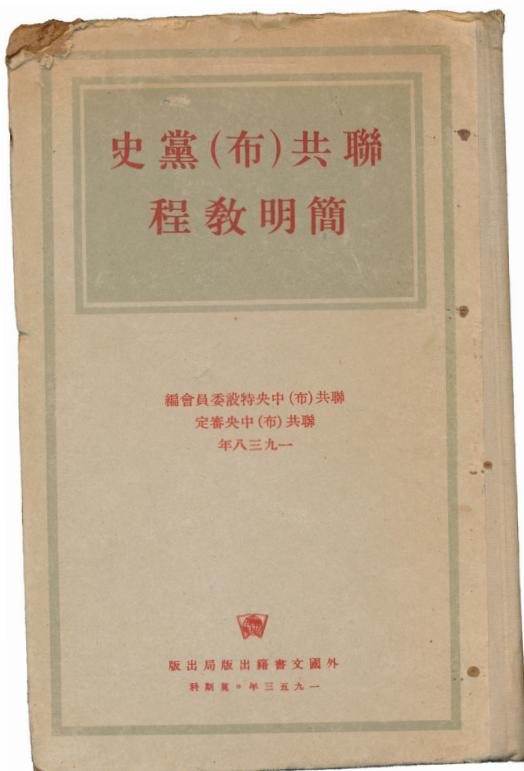
1946年夏，我的小舅舅中央大學教授吳世昌到上海來訪好友儲安平。吳世昌是全家最接近政治的。隨著戰後政治中心向上海的轉移，當時儲安平準備停辦在重慶的《客觀》周刊，在上海開創《觀察》周刊。吳世昌不僅是他的專欄撰稿人，而且在重慶幫助編輯並結束了《客觀》周刊。(《鮑彤自述》)

有一天儲安平到我家裏，媽媽煮了一鍋南瓜招待。餐桌上吳世昌指著我說，

這是鮑彤，愛讀書。儲安平記下了我的名字地址，送給我一套雜誌。這份《觀察》周刊從創刊第一期，直到被國民黨查封停刊的那期，成為我汲取知識的重要來源。這套雜誌 1966 年我的爸爸媽媽還帶到北京，不幸「文化大革命」時被抄家抄走。（《鮑彤自述》）

1947 年，表哥徐璇考入美國華盛頓大學（Washington University in St. Louis），臨行之前留下一本莫斯科印刷，署名斯大林著的《列寧主義問題》（1940 年，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我看了以後，感覺空前清晰易懂，具有相當的感召力。（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這本署名斯大林著的書當然是蘇聯共產黨寫作班子的理論宣傳之作。然而從中國傳統的「四書五經」，到新潮舶來的「意識形態」，中間怎會沒有閱讀理解的鴻溝？父親的回答是：「當時翻譯的列寧本人的著作我看不懂，但這本《列寧主義問題》讀起來簡單明白，感覺我們不僅是正義的而且是科學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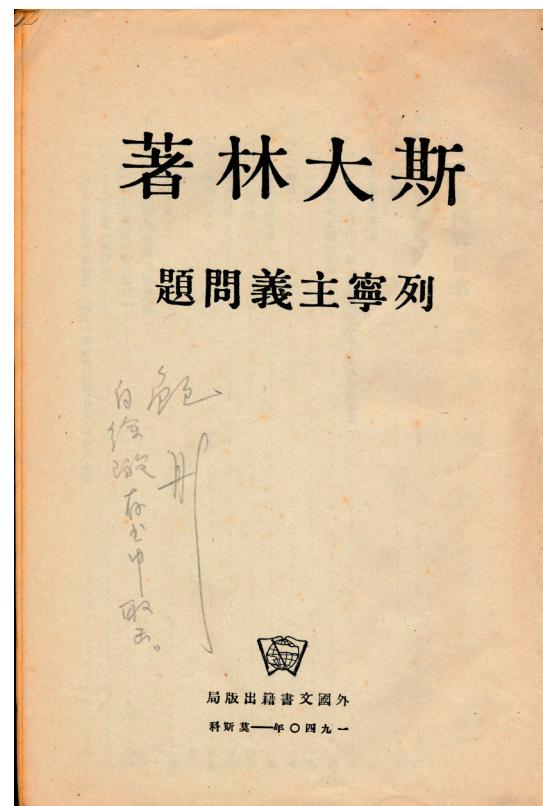


1948 年下半年，我經常和同班同宿舍的朱育琳一起交談，從討論文學進而討論哲學。他有一本從俄文譯出的舊書《辯證法全程》，我有一本剛由《觀察》雜誌社出版的吳恩裕教授的《唯物史觀精義》，我們交換着看。（《鮑彤自述》）

1953 年，同事華東局組織部組織科幹事宋元良看到我在讀小說，於是推薦我看《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說「比小說還要好看」。該書 1953 年的中文版也是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在莫斯科印刷。研讀了《列寧主義問題》和《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在中共黨內比之其他同事我的「馬列主義水平」算是比較高的。後來的作用是，1980 年代我在同胡喬木的次次爭論中都佔了上風。（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著林大斯

列寧主義問題題問



我從沒有聽到他講過一句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負

面評論。記得有一次談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我說「這篇東西的副題是『就路易斯·亨·摩爾根的研究成果而作』，所謂摩爾根的研究《古代社會》當時很有影響，現在差不多就是歷史垃圾」，他習慣性地兩眼一翻，表示話不投機，只是沉默不語，然後說：「摩爾根我沒研究過」。

青年時代的鮑彤是一名堅定的列寧主義者。《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沒有改變他酷愛看小說的習慣。他看的小說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有空就給我寫信，不要忘了。《十日談》很好看，有意思，也有趣。我每天晚上看它一段，頗能引人入眠。（1959年不詳某日妻蔣宗曹致鮑彤信）

今天我把《金瓶梅》借回來了，是圖書館新買的，共二十一本，等你回來就可以見著了，字較大，還有許多不堪入目的插畫，不是為你，我才不借哩。這只好作為長知識看看而已，我看不宜多看。（1959年12月12日妻蔣宗曹致鮑彤信）

除了茅盾和巴金之外，中國近代的歷史和武俠小說是父親所好的兩大門類。他對高陽小說的愛好，與對金庸小說相同，如他所說：「讀許晏駢先生的書，可以瞭解社會，讀查良鏞先生的書，可以涵泳性情。」

1992年夏天，剛被判刑7年不久，他篡改了金庸自創的由其作品書名首字聯成的那副著名的對聯「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並且事後曾大肆向我推銷：

碧鴛白俠劍書連，飛雪射雕笑鼎天；

而且跟附上讀後觀感和評價，成詩一首：

兒女性情詩有畫，霸王事業燼餘煙。
拈來百喻真般若，指到無明亦粲然；
潮湧錢唐仁者筆，仙靈不寫寫人間。

1993年，母親給獄中的父親送了兩套高陽小說，一部《慈禧全傳》，一部《胡雪巖》。下面這副對聯是他的讀後感。

官場商場風月場，娓娓開場，場場有戲；
正道奇道江湖道，頭頭是道，道道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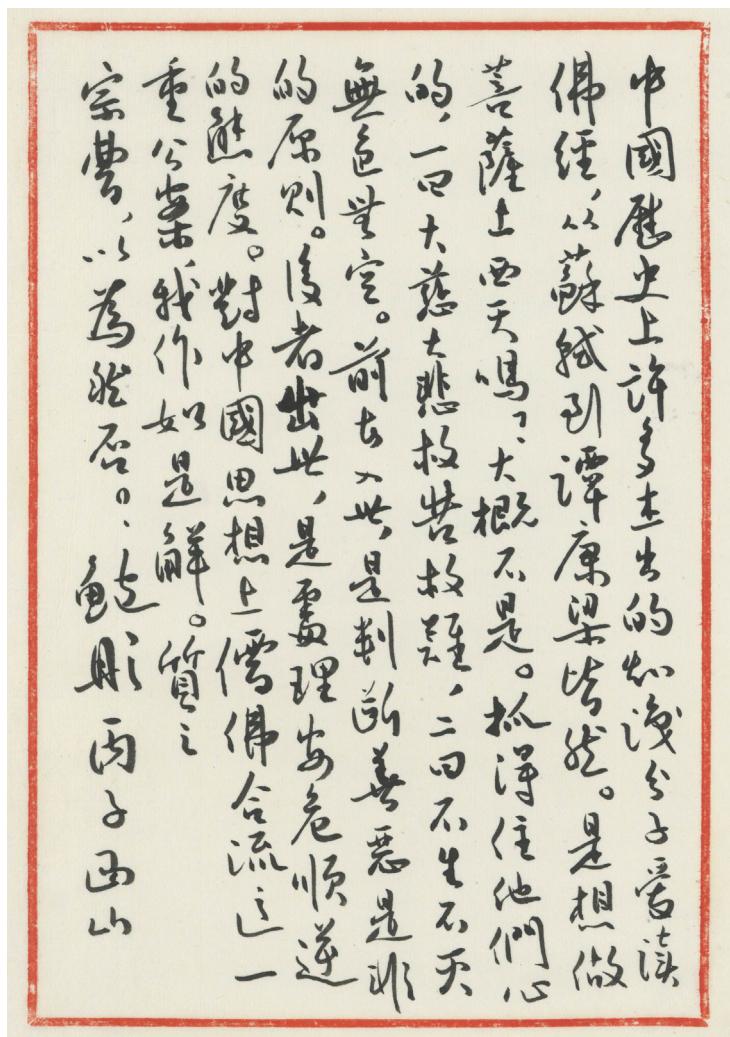
在秦城監獄度過的歲月，讓他更有時間讀小說。1994年回國探親，我在紐約機場隨意買了一本流行小說The Tale of the Body Thief。中文名《肉体窃贼》是美國作家安妮·賴斯Anne Rice的系列小說《吸血鬼編年史》(The Vampire Chronicles)的第四部，準備飛機上消磨時間，誰知沒看幾頁便呼呼大睡，對故事自然是沒什麼瞭解。不想回到美國之後，媽媽來信說：你爸爸要所有的安妮·賴斯的小說。更讓我吃驚的是，1996年父親「刑滿出獄」後，

他曾給我看過一張他歸納的錯綜複雜的「吸血鬼家族表」，上面密密麻麻擠滿了蠅頭小字。《吸血鬼編年史》使他能在獄中消磨時間的同時，也重拾起中學時代留下的英語閱讀。

父親很喜歡余英時，甚至同余教授曾有過少量書面的往來。我記得最初是余的《陳寅恪晚年詩文釋證》讓他看到眉飛色舞。他說「余英時從陳寅恪晚年詩文中讀出那些諷刺共產黨的意思，我看不出來，顯然比我水平高」。

父親生命的最後二十年中，我大約能夠每年春節期間回北京探望一次。年復一年，他書房裏面堆積的傳統經典書籍越來越多。有一段時間他研究佛教，很愛同我談讀經心得，由於我的佛教知識全無，記不得什麼重要的東西。幸好有一篇文字留下：

中國歷史上許多杰出的知識分子愛讀佛經，從蘇軾到譚康梁皆然。是想做菩薩上西天嗎？大概不是。抓得住他們心的，一曰大慈大悲救苦救難，二曰不生不滅無色皆空。前在入世，是判斷善惡是非的原則。後者出世，是處理安危順逆的態度。對中國思想上儒佛合流這一重公案，我作如是解。（未發表《鮑彤書法遺存》）



書法更是我平生沒有絲毫涉獵之事，他同我少有談及，只聽他說過「書法在於隨意，放鬆，寫出自己的個性。王羲之一篇《蘭亭集序》一氣呵成，裏面三個錯別字也不妨礙成為不朽之作。」

隨著父親年事漸高，由於視網膜老年性黃斑變性，視力越來越弱，不得不讓我將他最愛的一些書籍導入平板電腦以便放大字體閱讀。這些書包括《明清史講義》、《莊子今注今譯》、《論語正義》、《禮記今註今譯》、《孟子譯注》等等。看得出，在中國經典中他更喜歡孔子、孟

子和莊子。

大約在 80 歲以後，父親前後搜集了七八套各種中英文版本的《聖經》。近年來還要我搜來多種語音版，幫助他安裝在電腦上。有一段時間，他還參與過北京的一些《聖經》研討活動。大有不少人勸說他「受洗」。不過根據他對我說的一些關於基督教的言論，我懷疑他研究《聖經》的目的是出於尋找信仰。比如他說：「高爾基 (Maxim Gorky) 童年的教育讓他感到《聖經》裏面有兩個上帝，〈舊約〉裏面的上帝脾氣暴躁讓人感到恐懼；〈新約〉裏面的上帝和藹可親像個慈父。我也有同感」。有一次他說：「耶穌是個社會改革家」；我說「這是哪一門子基督教修正主義？」他將兩眼一翻，對我的輕佻表示不滿。我家也有兩個父親，一個是急躁傲慢倔強的父親；一個是大愛睿智的父親。

鮑彤與中共

1946 年，通過《中華民國憲法》憲法，憲法的產生和內戰的爆發是同時發生的，「戡亂救國」以後連國民政府也沒來得及實施。否則政治理想也可以通過「護憲」來實現。自從辛亥革命以來，孫中山就給中國人一個概念，中國的問題一盤散沙，只要團結起來，任何問題就可以解決。吳世昌當時也認為中國問題則是需要重建權威。(《鮑彤自述》)

關於平等，我是很嚮往的，是一個我追求的目標。當時唱的歌：山那邊啊，好地方，窮人富人都一樣。共產黨的名字聽起來也是這樣。(《鮑彤自述》)

1946 年冬天，我最初接觸到共產黨。那時，我身邊最好的同學都是親共的，有的已經是地下共產黨員。我們天天在一起讀書討論開會。參加活動有印象的是共產黨發動的「迎馬」，迎接馬歇爾 (George C. Marshall) 來華調解國共軍事衝突，避免中國爆發全面內戰。(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動員戡亂」以後，親共有一定的政治壓力，也會感覺到危險，因此，我當時寫了首詩叫「寒暑表」：「以自己腥紅的血水，已指示人间溫暖的存在。」(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站在寂寞的一角，
勇敢地忍受著命運的戲弄，
獻身於為他人的工作，
直到身碎的一分鐘。

漠然， 峭然，
面對著肅殺的到來，
以自己腥紅的血水，
指示人間溫暖的存在。

這首詩刊登在 1948 年底或 1949 年初某天的上海《大公報》副刊「文綜」版的右上角。1966 年 8 月抄家前，這份剪報一直保存在我手頭。（《敝帚一把》，人民日报出版社，1988）

我接受共產黨和老百姓是不一樣的。老百姓接受的是一個既成事實，也就是共產黨用槍桿子取得了政權建立了統治，而我是自覺自願，是以一種追求的方式加入共產黨的。」（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49 年初，南洋中學的蔣叔銘（後來文革跳井）問我：你看中國的希望在什麼？我說中國的希望在民主。他說你看誰能搞民主？我說國民黨恐怕搞不了民主，民盟力量太小，共產黨有力量。蔣說完全同意。後來蔣介紹我加入中共的時候要我寫對黨的認識，我在一張練習本紙上寫下的內容大致如此。」（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過了幾天，蔣同我說，明天有人代表組織找你談話，早上七點鐘，地點在貝當公園（Pétain Park 現稱衡山公園），你左手拿一份《大公報》，不必是當天的，把報頭露出來。有人會來問你現在幾點了，你回答：我也沒表，估計七點吧。」（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第二天，就是這樣我同共產黨組織接上了頭。後來我知道來人是上海南一區中學學委組織部長張效浚。同張談話以後，我宣誓入黨，宣誓的內容：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革命的利益高於一切；遵守黨的紀律嚴守黨的機密；執行黨的決議；做群衆模範；向群衆學習。臨別的時候，張從皮鞋跟裏掏出一張紙塞給我，我看是一篇陳雲 1939 年寫的文章「怎樣做一個共產黨員」，裏面就是宣誓的那些內容。（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49 年 4 月 12 日，是我生命中一個特別的日子。那一天，霎那間，我覺得，我這一滴水，似乎溶入到為解放全人類而奮鬥的共產主義洪流之中，似乎由「自在」進入到「自為」，人生從此具有一種前所未有的「意義」。（《鮑彤自述》）

1949 年 5 月，解放軍接管了上海。6 月，中共華東局組織部要求全體上海地下黨員登記。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填表，鄭重其事，字寫得工工整整。解放軍從山東南下，亟需任命幹部，有十幾箱幹部檔案需要整理。大概是因為上海地下黨普遍教育水平高。華東局組織部向上海市委組織部要 7 名上海地下黨員到華東區組織部工作，整理檔案。條件只有一個：字寫得好。（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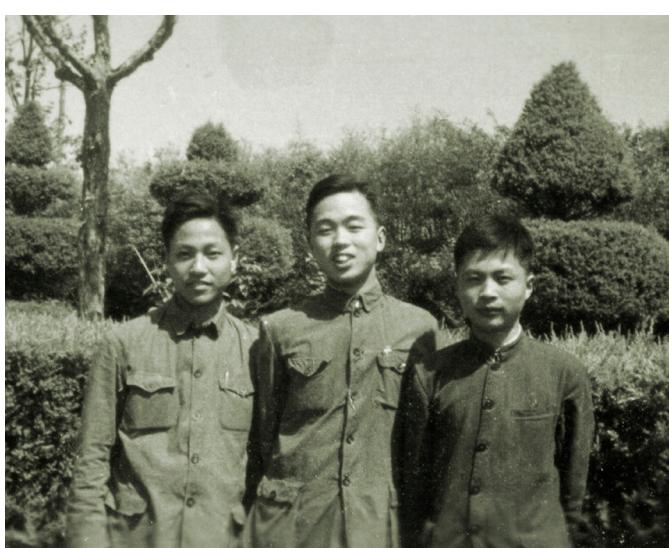
1949 年 7 月初的一天，我剛參加了上午的記者考試，原準備下午繼續考試，劉鳳飛中午趕來找我，通知說：「華東局組織部調你去工作。」我當時不知道華東局組織部是幹什麼的，劉也不是很清楚，只知道是個「領導機關」。我對她說：「我



正在參加記者考試，還有一天半才考完。」劉說，「這是組織決定！去吧。」我問：「怎麼去法？」她告訴我：「到區學委去『轉關係』。」我也不知道「關係」應該怎麼「轉」法，好在領導業已作出決定，操作起來倒也十分簡單。當天下午，我到區學委，遇到了書記錢其琛。他信手撕下一張便條，寫道，「市青委：茲有我黨黨員鮑彤同志去華東局組織部工作，請轉接關係。」下面簽署了他的名字。本來，轉關係是組織委員張效浚的事，張不在，錢代勞，開了這張條子。就這樣，我從區學委到市青委，再到華東青委，一步一轉。當天傍晚，就把關係轉到了終點站——華東局組織部。（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當時，華東局機關臨時辦公地點在江西路福州路口西南角上的建設大廈，一幢17層的高樓。據說，這本來是宋子文財團中的「中國建設銀公司」的辦公樓。報到後，取得一張出入「淮河部隊二支隊」的便條憑證，這是中共中央華東局機關當時的化名。為了保密，華東局機關被稱為「淮河部隊二支隊」，沿用了從山東南下時的軍隊序列。我被告知：「明天上午來上班辦公……以後就住在這兒。這兒有行軍床，不過，被子得你自己從家裏帶來。」（《鮑彤自述》）

這天到家已是晚上，我告訴父母，明天要去工作。父親默然，什麼也沒有說。母親愕然，問我：「不讀書了？」我答：「不讀了。」入黨前，我是學生，讀書是天職；成了黨員，革命就是新的天職。這是兒子的信念，但母親有些傷感。（《鮑彤自述》）



1951年5月20日鮑彤、顧慰慶、姜珣

第二天一早，我挾起一床薄被，離開了家。一路上，哼著「我們的隊伍來了」，從貝勒路走到福州路，開始了我的革命工作生涯。（《鮑彤自述》）

入選華東局組織部的有三男四女，其兩個大學畢業生五個中學畢業生。男的有顧毓秀之子顧慰慶。那時，我同顧慰慶關係最好，原因是什麼事情都有主張，我什麼事情都沒主張，總是跟著他。（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就這樣，我從 1949 年 7 月進入華東局組織部直到 1954 年初。（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到華東局組織部，我很興奮，一是覺得自己在討論國家大事了；二是任何事情都自由討論，沒有任何禁忌，甚至可以提出毛澤東也不代表共產黨。吃飯時一鍋飯菜，八個人圍在一起，自由組合，經常討論各種問題。（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接管了全國的政權以後，共產黨立即停止發展新黨員。按劉少奇的話，以前有敵人管著我們，幫我們把黨管好了。膽子小的不革命的人不敢來參加。掌了權以後，一切野心家、投機分子，懷著各種動機，那怕爲了找份工作都要入黨。（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不發展黨員到 1951 年吸收「土改積極分子」入黨結束。「積極分子入黨」聽起來沒什麼問題，到了「大躍進」就成了「說謊的人入黨」，這是始料不及的。（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59 年在寧夏我碰到一件事情，寧夏自治區黨委組織部長楊滄（原廣東一個地委書記）同我聊天，談到 1958 年「反右」他與省委第一書記李景膺的矛盾。他說李要畝產 1000 斤，我說要 800 斤，就定我是「右傾」，最後實際畝產才 400 斤，那就是說我們兩個都左了，他比我更甚，結果我被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他說的給我印象深刻，一直難以忘懷。（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50 年中共東北局第二書記張秀山為團長的「黨的組織工作者代表團」赴蘇聯學習。蘇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庫西寧（Otto Wille Kuusinen）接待。蘇共中央組織部介紹蘇聯黨的組織機構中的內部設置，黨委下設工業部、農業部、交通運輸部、計劃財政財貿部等專業管理部門。中共在組織上模仿蘇聯的黨領導模式來源於此。（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51 年冬天，我第一次出差，從上海到濟南，參加康生領導的山東分局的統計工作會議。1953 年，學習蘇聯的幹部制度，我被派到上海電機廠實踐學習，帶隊的是周保瑞（後任山東省外辦主任）和印邦昌。同年，中共模仿蘇共在中央組織部內建立工業管理處、交通管理處、財貿管理處、文教管理處等，開創了控制一切社會生活的黨組織結構。中共中央組織部下令，由六大區組織部調 100 名縣級以上幹部到中央組織部加強幹部管理工作。華東局報了幹部處長李均、我，還有高憲民的三人名單。於是 1953 年底，我就被決定調到中央組織部。（2018 年—2020 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53年1月，斯大林的死訊傳到北京，父親大哭一場。這是父親自己說的，但我同姐姐卻從沒有見過他在任何場合哭過。

1957年4月27日，中央發佈了《關於整風運動的指示》……對於黨中央的號召，我積極回應，遂報名要求到農村去。5月上旬，組織部批准5個人到河北省遵化縣進行勞動鍛煉。（《鮑彤自述》）

機關裏搞反右派，我們要學習到八月初。問題很多。譬如這次右派活動矛盾的性質是人民內部矛盾，還是敵我矛盾？右派分子是否是廣泛所指的左、中、右三類人中的那種？這兩個問題是曾經我在黨小組會談話時提過的，但是有些人的解釋我仍然不滿意。因為，我覺得這次反右派鬥爭絕不是人民內部矛盾，而應該算敵我矛盾，但又覺得中央在處理這個問題時，又是以人民內部矛盾而處理的。百思而不得一解，你認為如何？（1957年6月31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1957年7月，勞動鍛煉結束，我回到北京，還沒有來得及向組織彙報農村觀感，就捲入了「反右派鬥爭」，成了反右的對象。（《鮑彤自述》）

組織上要求交代有沒有右派思想和右派言論，我的回答是：有，我對所有的右派都同情，同他們的言論都有共鳴。組織上說這可不是開玩笑的，你有證據沒有。我說有筆記為證，千真萬確。當時農村裏有人提意見，我認為很不錯，做了記錄。此外，張伯駒、羅隆基、儲安平、費孝通的那些主張，我認為都很好，日記上寫的很明白。組織也沒辦法，就開始批了。1957年8月從我回來以後就開始挨批，一直到1958年1月。（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大字報說，部長安子文、幹部管理處處長劉植岩和研究室主任趙漢（兩位均為部務委員）包庇我，使我「漏網」了。我相信，劉植岩「包庇」我是有可能的，他的確很關心我。但趙漢認識我是在1958年，安子文認識我是在1960年，既然當時並不認識我，似乎不太可能包庇。不管是誰包庇，1958年1月，中組部認為，我雖然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但可以從輕發落，免於處分。於是，讓我和 other 需要鍛煉改造的30餘名幹部下放勞動，帶隊人是部務委員趙漢。（《鮑彤自述》）

1958年5月初，安徽省委要我們轉移到長江邊上的無為縣。這個縣很大，是魚米水鄉。全縣有100萬人口，180萬畝耕地。（《鮑彤自述》）

安徽省為了「大躍進」，採取省委書記「包乾制」，原李先念部下，省委副書記曾慶梅立下軍令狀，保證一年改變無為面貌。曾慶梅聽說有中央組織部幹部在安徽，要求這些幹部調來幫助他改變無為。於是5月5日，我們都去了無為縣。這個日子我記得清楚，因為是馬克思生日。（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無爲是有一百萬人口的大縣，挨著長江，本是非常富裕的地方。我同趙漢都到了無爲縣官鎮鄉鎮河農業生產合作社。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都是在這個事件發生的，徵過頭糧就是在這個地方徵的；臨走時同縣委大吵一架也就是這裏，回來以後要向省委告狀，省委拒不理睬。後來安徽省委向中央告狀說組織部是「撤退派」。而在安徽「闖禍」的是我。（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8月20日，《人民日報》登安徽省包括官鎮鄉在內放中稻畝產「衛星」，恰巧我在另一個新華農業合作社總結經驗。當時，我不知道這是省委幕後策劃的。那片「衛星田」和我勞動的鎮河農業社緊挨著，老百姓跑來告訴我，那個「衛星」是假的。（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大零件
動。這
零件加
總結了
，經過
研究和

采用
總賬
施。應
這設
批大
的。考
方針
“竭
趕上
加工
用機
助工
段氣
造廠
業的
技術。
在的
組合
手
要性。
的機
前我們
型機
如
蚊噓
十分重

東北機器製造／获得好經驗 中央領導同志重視這個創造

开·镰·大·吉 中稻初現萬斤田

新华社合肥19日电 安徽省二千七百多万亩中稻已开镰收割，现已出现了三个亩产万斤以上的中稻“衛星”。无为县官镇乡官镇社收割一亩零四厘中稻，实收干谷二万一千五百一十四点五斤，平均亩产二万零六百八十七斤；无为县护河乡一公社收割一亩二分五厘中稻，共收干谷一万五千四百五十点五斤，平均亩产一万二千三百六十斤；肥东县长临乡建光社收割一亩六分一厘中稻，共收干谷一万八千四百二十一点五斤，平均亩产一万一千四百四十一斤。这三块高产中稻田，在收割时都有当地党政领导部门派人监督检查。

据新华社长沙19日电 湖南省刚开始收割中稻不几天，中稻亩产量就突破了万斤大关。这是南县明山头乡五一农业社第十六生产队突破的。这个队的队长

黃明江、副队长刘柏树、妇女队长萧爱英、民兵队长甘城香、老农曾保生等共同种的一点一四六亩中稻试验田共收干谷一万三千四百二十二斤，平均每亩产干谷一万一千七百一十二斤。8月14日经县委验收工作组、县、乡、社干部和群众四十多人验收证明属实。这丘田原来泥脚很浅，中稻产量一般只有二百—三百斤。今年开始作试验田，经过精耕细作和大量施肥，获得了万斤以上的收成。

**安徽官镇社1.04亩亩产2068斤
安徽一公社1.25亩亩产12360斤
湖南五一社1.14亩亩产11712斤
安徽建光社1.61亩亩产11441斤**

中越人民的共同喜悅 河內農民賀湖北農民早稻高額丰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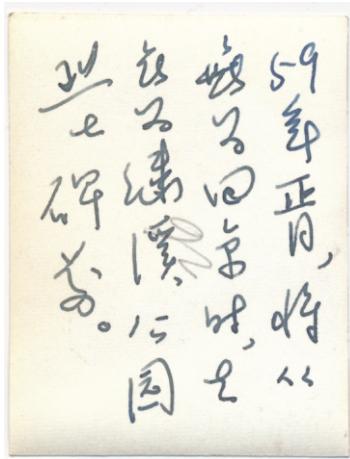
新华社河内19日电 河内市郊农会执行委员会最近代表河内郊区十六万农民写信给中国湖北省农民，热烈祝贺他们创造早稻高产的巨大成就。

把十畝地的稻子拔出來，栽到一畝地上，然後五天以後收割。當時不斷聽到全國各地放農業高產「衛星」，我都信以為真，但安徽這個我去一看是假的。如

此，我就給中央寫了一封信。（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信裏我說：現在全國大躍進形勢下，人人都很振奮。只是安徽這個地方出現一個很不好的現象，放假衛星。我所在的「鎮河農業社」與「關鎮農業社」是連片的，放衛星的地方離我只有幾里地。我知道十畝地的水稻被移栽到一畝地上，然後過五天後收割，計產量。這種弄虛作假是歪風邪氣，在當地老百姓當中影響很不好，也敗壞了我們黨「大躍進」的名譽。（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有一天，六處處長段血夫被指名去參加省委電話會議。我只記得段血夫回來慌慌張張說：鮑彤！你惹事兒了！



原來電話會議是中央辦公廳的陳麒章就我的信的內容，聽取安徽省委的調查報告。（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安徽這邊省委第一書記曾希聖正在北戴河，省長黃岩參加。黃說：「我們接到中央電話和文件，非常重視，立即派省委常委、農村工作部部長張世榮展開調查。現請張世榮彙報。我今天感冒，不再說了。」張世榮說，我沒有通知任何地委縣委幹部，立即去了當地直接找了群衆。現根據群衆所說報告：一畝地的產量確實是十畝地的莊稼合併起來的，但是合併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弄虛作假，而是爲

了抗旱救災。有九畝高地出現旱情，為搶救糧食，群衆把莊稼合併到了一畝有水的地裏去。因此鮑彤反映的情況是不真實的。（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不久，政法幹部處處長李步新到安徽來找我說：「安部長專門講叫我告訴你兩句話，第一是情況已經都清楚了；第二是不要再提了。」我說：「那東西明明是假的，怎麼能不再提了？」李步新說：「剛才我同你說了什麼？！」我愣住了。李步新又說：「安部長說『不要再提了』」，說完我們兩個一起笑起來。大家心裏都是清楚，曾希望是毛澤東信任的，這個問題要由上面解決。（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我對人民公社很感興趣，你們那裏恐怕也準備搞了吧？好像辦了人民公社就到了共產主義社會了，你們能接觸到這些新鮮東西真是幸福啊。有時間請告訴我，有關這方面的消息。（1958年8月26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1959年，從安徽回來，劉植岩問我：你覺得有點什麼收穫嗎？我說：「我得出個結論，如果我與黨組織黨中央的觀點不一致，那肯定是我錯了。」劉植岩回答：那也不必那麼矯情。（編註：矯情的漢語原涵義指，故意扭曲自己的感情，掩飾真情。）1967年，我正被關「牛棚」，四川造反派找到我，讓我來交代劉植岩，說劉植岩已經「叛黨」自殺了。（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大躍進」後，連續三年，全國餓死上千萬人，既與天災無關，也與土地肥瘠無涉。事後，可以看出的規律是：凡是「三面紅旗」舉得最高、反右傾最厲害、浮誇風最盛的地方，一定是餓死人最多的地方。其原因是，浮誇導致虛報糧食產量，國庫按虛報產量徵購，必然侵佔農民的正常口糧，致使大批農民在青黃不接時無食果腹，飢寒交迫。因此，餓死上千萬人的起因在於政治。全國究竟餓死了多少人，我沒有做過專門研究，只聽說過兩個數目字。（1）1962年，李先念告訴中監委委員王維綱，他估計：「安徽全省餓死人數在300萬到500萬之間。」這是我們研究室一位隨王維綱到安徽去檢查工作的幹部轉告我的。（2）河南省光山縣，1958年大躍進前的人口是30萬，1960年底只剩下10萬人，減少了2/3。這個數目字，是隨著信陽問題的暴露而浮出水面的。（《鮑彤自述》）

1963年那年，在組織部突然聽說有個「雷鋒事跡報告」，我印象深刻，感覺天天宣揚自己做了什麼好事，事先安排做好事，照照相，公開吹牛，在中國歷史上以前好像沒有。後來，又出了陳永貴如何如何，越來越多。共產黨全面說謊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形成過程。（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96年5月27日零時「出獄」的形式實際上是個莫大的笑話。因為「出獄」後父親卻不能回家，又被繼續非法羈押一年。地點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西山管理處」。

1992年4月16日，中紀委派了兩個局長和一個工作人員，到秦城來，向我宣讀中共中央政治局關於開除鮑彤黨籍的決定。（《鮑彤自述》）

政治局的這個決定，給我戴了一項「嚴重觸犯刑律」的大帽子，卻沒有講任何事實，這迫使我無法用事實答辯。但是，這個決定有兩個致命點：一是不符合《中國共產黨黨章》，二是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有關法律。（《鮑彤自述》）

根據決定，直到1992年3月，才撤銷我的中央委員職務。這豈不是說，在我從1989年5月28日到這個撤職決定中間2年零8個月的時間，我仍然是合法的中央委員，卻被不合法地關押！這個「決定」說我「已嚴重觸犯刑律」，我問：「我到底犯了什麼罪？」宣讀者竟然拍了一下桌子，說：「你自己還不清楚？！」作為回擊，我也跟他拍了桌子，說：「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就是這樣辦事的？這就是你們的工作作風？！」（《鮑彤自述》）

從感情上父親對開除黨籍的決定看得比判刑 7 年要重。為了「被開除出黨」他向中央常委和鄧小平陳雲寫了一封申訴信。我的感覺是他事後嘴上雖說「從那天起便同共產黨分道揚鑣了」，但内心裏仍難就此放下。

1996 年 5 月 27 日，午夜零時，他們把我從囚室裏帶出來，帶到秦城監獄南門口西側的一間小屋。小屋裏有一張桌子，桌上擺著一張白紙，紙上有黑字，蓋著「秦城監獄」的紅色圖章，圖章的中心是一個象徵中國共產黨的五角紅星。這張有黑字和紅章的白紙叫《公安部釋放證明書》。（《鮑彤自述》）

在監管人員向我宣讀過這份釋放證明書後，秦城監獄監管處處長唐國青和北京市公安局張遠找我談話。後來，我知道，北京市公安局根本沒有張遠這個人，他是公安部一局的副局長。為什麼要匿名和我談話？不知道。為什麼是在午夜零時把我帶出來？那是因為我是在 1989 年 5 月 28 日進來的，後來判了 7 年，到 1996 年 5 月 27 日零時，整整 7 年。超過一分鐘，就侵犯了我的人權。（《鮑彤自述》）

1996 年 5 月 27 日零時「出獄」的形式實際上是個莫大的笑話。因為「出獄」後父親卻不能回家，又被繼續非法羈押一年。地點是「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的西山管理處」，對外叫「杏林山莊」。與監獄不同的是，在這裏家屬可以探視和陪住。下面是我在那裏陪伴父親時的親眼所見。

「出獄」之時，便是父親開始「維權」之日。父親同中央辦公廳派來的一位幹部發生爭論。此人脾氣上來，將嘴一撇：「你不就是說共產黨違法嗎？共產黨違法同我有什麼關係？」砰！父親拍了桌子，兩眼一翻，眼白一閃而落，一句我很熟悉的話終於沒能說將出口又嚥了回去：「你懂什麼？」此人走後，他同我說：「孟什維克（Mensheviks）還是普通性質的政黨；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從『全面說慌』到『全面違法』都是一回事，搞到最後就是黑社會。」看到他臉色鐵青的怒相，一句湧到嘴邊的玩笑「你怎剛剛明白」卻是說不出口了。這是我從他的嘴裏聽到針對列寧主義政黨最嚴厲的批評。

父親從未否認過他所加入的共產黨的正當性，他說過「如果我當年的選擇是錯誤的，那麼那個時候全世界都在做錯誤的選擇。」

10 年前，有一天我在瀏覽書報，無意中赫然見到一篇關於父親的專訪報道，標題醒目〈如果仍在體制內我也一樣是個腐敗分子〉，作者是張彥（Ian Johnson），文章發表在 2012 年 6 月 14 日的《紐約書評》（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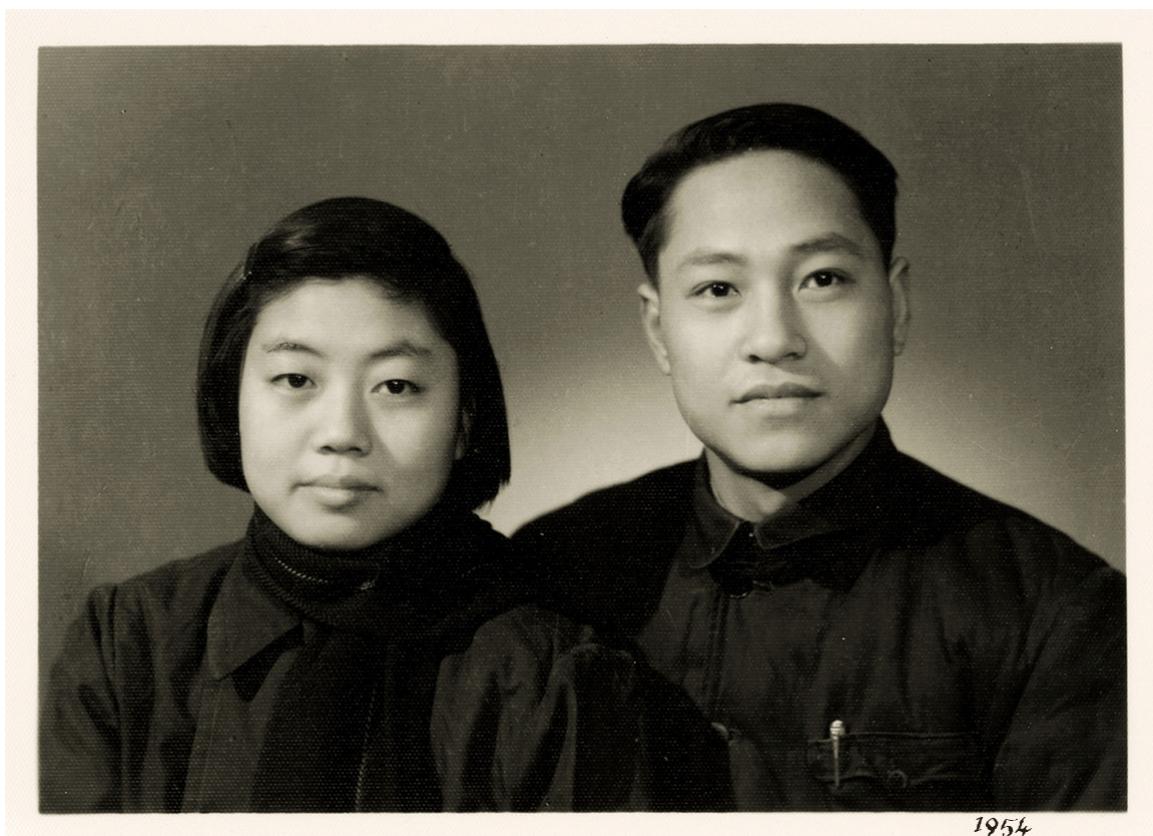
根據我的觀察，大概是經過了相當長的過程，父親方始認識到那個他「自覺自願以一種追求的方式」加入的共產黨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已經無影無蹤。確切證據來自他那著名的「郭文貴是我老師」言論，時間大約是 2017 年的下半年：

郭文貴就是我的老師。郭文貴打開了我的一個眼界，我過去也在想共產黨是一個什麼顏色？我一直說是紅色；郭文貴告訴我是黑色，這就打開了我的一個思路。我從來沒有想過共產黨是黑色的。（網傳視頻片段）

愛情與婚姻

宗曹同志：倦極。……22日早晨，我的錶玻璃壞了，我沿著大馬路折向緯二路到一家修理鐘錶的鋪子裏去配。一進門，便是一間矮小的房子，角隅裏安上一個桌子。一個小伙子在桌上跟前「操作」。從桌子那邊接過來是一床板鋪。兩個老師坐在那上面聊天。一個向另一個解釋著「四個朋友三個敵人」（見下註）的「大政策」：「這是最大最大的政策！你不學這個，光知道共產黨毛主席好，可好跟不好就是沒有個界限。學了才明理！」他們一個是開鋪子的，另一個是中醫大夫，聊得這樣火熱，知己也就這樣有內容。咱們的工作真是深入到了城市街道群眾中去啦！（1951年冬鮑彤致蔣宗曹信）

1951年冬的這封信是父親在婚前寫給蔣宗曹的第一封信。信是鮑彤在外地出差期間寫的。如以追求女孩子為目的，按當代的標準這是一封非常奇葩的信。形式是「游記」式的關於風土人情的觀感，內容則是共產黨政策的「宣傳效果」。其中的歷史背景需要稍作解釋：1950年6月，周恩來在七屆三中全會上說：在新的時期，三個敵人（即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四個朋友（即無產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的界限必須劃清。今天的中心問題，不是推翻資產階級，而是如何同他們合作。



1954年秋天，蔣宗曹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俄文系。也從上海搬到了北京。那時我每個禮拜天都去看她。入學不久，她被查出患有肺結核，結果學校退學，按規定要退回原單位，但是華東局已經撤銷了。於是我就去找李均，李均很爽快說那就到中央組織部來吧。因此當年蔣宗曹就調到了中組部幹部處。（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1954年底，蔣宗曹被安排到中央機關在北京郊區的黑山扈肺病療養院治療。1955年春治愈出院，得了傳染病，原室友嫌棄，沒地方住，於是我們乾脆就決定結婚，日子就定在她出院那天，剛好又是4月12號，我一生中第二個「412」。（《鮑彤自述》）

「4月12日」對於我來說，是非常特殊的日子：1949年的4月12日，我加入中共國共產黨；1953年的4月12日，是我的文章第一次在《解放日報》上公開發表；1955年的4月12日，我與蔣宗曹結婚。1968年4月12日，當了文革黑幫，我接到禁令：「從此不准回家」。（2018年—2020年錄音整理的「鮑彤口述」）

你在信中提到的一些對愛情的看法，我完全同意。愛情究竟是什麼呢？用亨利•菲爾丁的一句話說是：「……人們胸膛中存在著一種善良、仁慈的意向，它在促進別人的幸福中得到滿足」。……愛情不僅是一種為了促進別人幸福的愛，而且在這種促進別人幸福的愛裏面自己又取得了滿足和愉快，這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感情，真正的愛情——建立在促進雙方共同幸福的基礎上的愛情。愛情處理得好是一件很愉快地事。丁玲好像說過：「如果一個人把戀愛處理得很好，那他不但感到這個世界很可愛，而且有一個人特別可愛，覺得到處都是光明快樂，生命特別充實起來……這種關係是彼此了解，彼此尊重、彼此相愛，攜手前進的……」當然，在共產黨員來說，還應該有其他標準，求得對革命、對工作、對個人幸福有利。（1955年2月28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先同志、後結婚、再戀愛的倒逆時空的做法，今天很難完全理解。可能是文化大革命中抄家的結果，父親的大部分信件已經遺失。不過我大致知道所謂「信中提到的一些對愛情的看法」究竟是什麼，出自何處。多年前，父親向我推薦了一本車爾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的《怎麼辦》，並說這是個「最動人的愛情故事」。無論是18世紀英國小說家菲爾丁（Henry Fielding）還是19世紀俄國作家車爾尼雪夫斯基，到底能為他們提供多少愛情的精神養分是很可疑的，已經無從考證，然而，真正在兩人關係起過明顯作用的是他們共同服務的黨。

親愛的，很想你，但是這是很愉快的，想我總是想你回家的時候一定變得多了，也許你會看不慣我了——知識分子的氣味。但是這個沒有關係，我會向你

學習的。有志氣，有朝氣，真正自覺地改造自己，真正樹立起革命的人生觀。

(1958年2月10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希望你好好勞動，好好鍛煉，自己永遠也不要自滿。另外，我感到你在信上從來不談自己的思想問題，這是為什麼我總是在這方面挺擔心的。(1958年6月6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你說你現在除了老老實實的工作以外，沒有別的想法了。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要因為過去有許多錯誤思想，而在工作上束手束腳，也應當敢作敢為，解放自己的思想。有錯就改，應當有這種勇氣才行。(1958年7月7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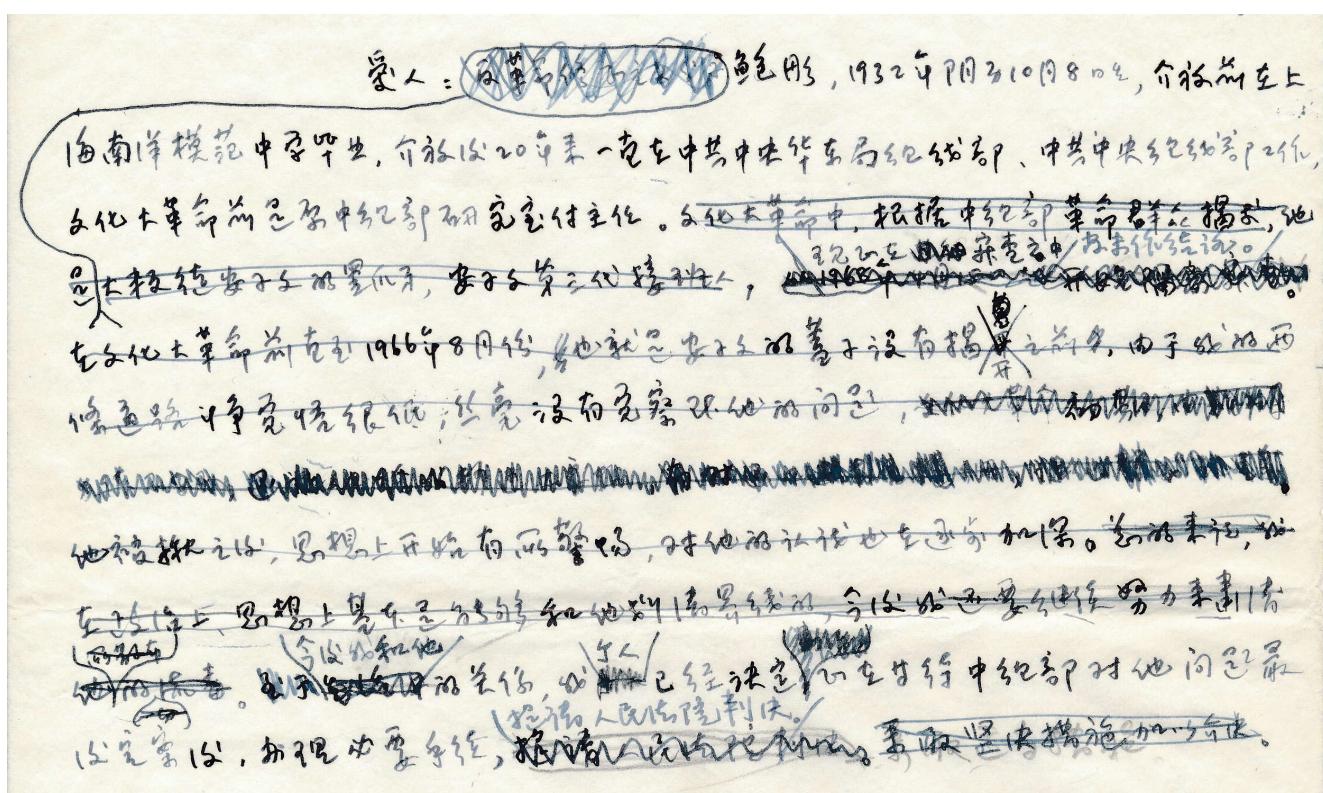
時常在惦著惦著你，只要你勞動好工作好身體好我就放心了，不知為什麼為了你，我總是那麼前怕狼後怕虎的，你真是我的一個大包袱！欲丟無法？！(1958年7月17日蔣宗曹致鮑彤信)

在1969年，蔣宗曹的題爲「自報材料」上寫道：

愛人：鮑彤，1932年陰曆10月8日生。解放前在上海南洋模範中學畢業；解放後20年來一直在中共中央華東局組織部，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文化大革命前，是原中組部研究室副主任。現正在審查之中，尚未作結論。

已經落下的文字中，有被勾劃刪掉的一段：

文化大革命中，根據中組部革命群眾揭發，他是大叛徒安子文的黑爪牙，安子文第三代接班人，在文化大革命前，直至1966年8月份，也就是安子文的蓋子沒有揭開之前，由於我的兩條道路鬥爭覺悟很低，絲毫沒有察覺他的問題。他被揪之後，思想上開始有所警惕，對他的認識也逐步加深。



蔣宗曹繼續在編譯局工作，但文革期間夫妻之間已經沒有往來的書信和文字留下。後來 30 多年以後，鮑彤因「六四」事件被關押期間，文革當中曾經為選擇「愛人」和「黨」陷入兩難的妻子這次卻是義無反顧地選擇了「愛人」。下面的文字，摘錄於蔣宗曹 1989 年至 1997 年所記《「飛行」日記》（「飛行」指「非刑」）。

1989 年 7 月 7 日——這是鮑彤被逮捕的第 42 天。

在以往的 41 天中，心平靜到了極點，因為我深知鮑彤的清白；但也緊張到了極點。我也知道，對待無辜的人的最強大有力的武器是「莫須有」，而羅織「莫須有」，卻是天下最輕而易舉的事，……不需要任何事實，不需要任何根據。這早已被南宋的風波亭所證實，而在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發展到了熟練無比的程度，積累了異乎尋常的豐富經驗。

就這樣，在這種極度平靜和極度緊張中，我度過了 41 個白晝和黑夜。但我仍然不知道謎底，不知道鮑彤為什麼被捕，或者說得更確切一些，不知道鮑彤將被加上什麼罪名。現在謎底終於揭曉了。

根據這個國務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所做的報告，鮑彤犯了兩條滔天大罪，第一是洩露了國家絕頂重要的軍事政治機密，即戒嚴；第二是他主持開了一個密謀策劃的會。原文是這樣的：「(5 月) 17 日晚，鮑彤召集了中央政治體制改革研究室的部分人員，在洩露了即將戒嚴的機密後，發表了告別演說，警告與會者不得把會上密謀策劃的情況透露給別人。否則就是「叛徒」，是「猶大」。」

如果說，鮑彤找了某個特務內奸「密謀」了什麼事，鮑彤將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而鮑彤是向政改研究室的部分人員「洩密」，那就必須由與會者出來作證。陳希同當然可以「代表國務院」無中生有，但與會者會不會無中生有，那就由不得陳希同了。第二，說不出「密謀策劃」的具體內容，足見純屬虛聲恫嚇。

如果說此前，我入夜難眠，那麼，1989 年 7 月 7 日夜裏，托陳希同這個代表國務院向人大常委作的報告的福，我安然酣睡了個安穩覺。

最後的日子

2022 年 7 月 18 日，頗經一番「防疫」的周折，我終於抵達北京。此時父親母親均已身患絕症，他們都再也沒有出過醫院。母親已處彌留之際，在一個月的探視當中，她的精神能夠凝聚起來，認出我的時間一共不過 20 秒鐘。

他們的臥室裏，人去床空，周邊的矮櫃上凌亂地堆滿了藥盒子。母親的床頭櫃上有一本《西班牙語 900 句》，一本《挪威的森林》摺著翻開幾頁；父親的床邊除了常年堆放的《辭海》和英語課本和英漢詞典之外，放了一本翻舊的《龔自珍己亥雜詩注》、一本我從香港帶給他的《雙照樓詩詞藁》，還有一本中譯《蘇格拉底之死》。想起從前開的玩笑說他們兩人「一輩子絕不看同一本書」，悲涼之中不禁莞爾。



鮑彤 (1932—2022)

起初進病房探視的時候，父親還能用平板電腦看書和上網，并沒有同外界的信息斷絕。有精力的時候他喜歡上網玩社交媒體「推特」。他說過「『推特』這東西讓人上癮。革命的時候誰最極端就跟誰走；推特很有意思，言論越極端點贊越多」。我勸他說「不必同匿名謾罵的互動浪費精力」，他說「網上互動能有效預防『老年癡呆』」。甚至要我幫他開過一個小號，兩個「推特」號互動，自己一問一答，好不熱鬧。以往我們每次見面，我大約總會轉達一些分析人士向父親提出的一些關於時政的問題。例外的是這次他基本上沒有什麼興趣談論時政。最有實質內容的是，他說「今天的中國人還是在文革的陰影下活著。文化大革命說到底只有一句話是真的，那就是『誰反對毛主席就打倒誰』，現在只繼承下這麼低級的一個東西，還有什麼好去評論的？！」

我們的談話漸漸歸攏到一些人生的終極問題。他多次談到基督教，而且很有心得。他說「真、善、美，實際上是一回事！很深刻！」他讓我去查這一思想最早來源於何處，相信他是沒有看過什麼阿奎那 (St. Thomas Aquinas) 之類的中世紀神學著作。談的最多的還是孔子孟子和莊子，他說「有了孔孟莊，如何做人就清楚了」。我又問他，在他的一生中孔孟莊和共產黨的關係是什麼。他說「我在黨內誠心誠意言行一致地幫助它；我在黨外就誠心誠意言行一致地去批評它，這就是孔孟莊做人的道理。」記得他曾經說過，孔子孟子同人本主義二者本質上「是一樣的東西，都是實現人的價值」。

父親看完的最後一本書是余英時的《論天人之際》，之後就再也沒力氣舉起那個伴隨了他九年的平板電腦。讀後感我只聽到一句「經歷了毛澤東時代以後，中國就從此不再是中國了」。

2022年11月9日凌晨，他在嘔吐中掙扎，思緒仍在持續，在一連串聽不清楚的話語中，我只清晰地辨認出「……杞人憂天……」。雖然這是他留在人間的最後幾個字，但我永遠也不會知曉它們確切的含義了。

2022年11月14日